

# 從中國佛教的興衰論

## 論太虛大師佛教革命的意趣

悲昇

太虛大師，法名唯心，俗名呂澄森，浙江崇德縣人，生於一八九〇年，殆於一九四七年。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革新者，一位使中國乃至世界佛教起到歷史性轉折，重新邁上坦途的佛教偉人。

宋明，是中國新舊文化的過渡時期，亦是釋道儒三教合一的嚆矢。同時，也是宋明理學發展的最高峯期。其間外道邪衆亦相繼崛起，固有文化的衝擊，異道的排擠，加上僧衆對社會的迂回逃避，使得佛教發展前景由鼎盛時期滑向衰落，日現蕭條，一不振。

另一方面，為數衆多的僧人，或不喜名利、或憤世嫉俗、或好晏坐，則遷居深山、古刹，隱居潛修。過着了在世人看來；悲觀厭世，消極逃避等與世隔絕的生活，紅牆碧瓦，成了僧俗的界牆。彼此各懷謹慎，不敢跨越雷池，使佛法脫離了社會，思想日趨僵化。

清末民初，戰禍頻繁，烽煙四起。導致一些叢林古刹寺傾僧無，為一些刁民外道所乘。在中裝僧扮道，幹盡損人利己，危害人羣的勾當。不明真相的民衆將一切罪過傾諸佛教，對僧人深惡痛絕。令純潔的僧團，清淨梵行的出家僧衆蒙受了莫大的不白之冤。究其原因，亦起自僧人遠離了社會人羣，再加上當時佛教內部的三濫，「濫傳戒、濫剃度、濫住持」。使得本已不成體統的佛教更趨腐化。

佛教源於印度，中興於東土。所闡揚倡導的皆是大乘佛教思想，主張出世入世，自他雙利。但是，朔尋歷朝歷代，真正能夠暢佛本懷，使佛法深入社會民間，履行諸佛菩薩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。」度生恒願的高僧大德，實在少見鮮聞。兩晉、南北朝、隋唐，一度被稱為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。佛教發展，如雨後春筍。而且一些宗門耆宿倍受帝王寵護，甚至官袍加身，位居極尊。帝王的護持，達官顯貴的信奉，使得僧人地位顯赫，衣資豐富。從而萌生了自命清高，不可一世。養成了坐以待食，不勞不作等陋習，致使一些信仰與非信仰的民衆，對出家人的勢力

國家的內憂外患，新舊思想的強烈鬥爭，洋教洋文化的輸進，迫使一些仁人志士四處奔走，通過各種渠道，尋求救國安民的真理。太虛大師欣逢此際，深感救國興教勢在必行，遂於一九一

一八年偕同章太炎等護法人士，創「覺社叢刊」，邁開了佛教革命的第一步。

覺社在宣言中指出：「值此國家內憂外患之秋，唯有大乘的佛教精神，才能担负起改造世界，挽救中華之歷史使命。」從而將隱沒了數百年的佛教，引上了現實社會，使大乘佛教出世入世、利益人羣的精神得到了淋漓盡致地發揮。使佛教與人生，世法出世法再溶一爐。茲就幾個方面來說明太虛大師佛教革命對後世佛教發展的影響。

**教理革命**：清水流淌千里，會因外緣的染着而成渾濁。那麼，佛教在經歷數千年傳承後，受本土固有文化影響，地方風俗感染，亦難免陳腐糟粕充塞其中。再加上譯解不同，領畧差異。外道邪教理論亦摻雜其中，佛教已是五花八門，令學者信者真偽難辨，莫衷一是。教理革命，旨在却弊揚正，將教內陳腐糟粕，邪知邪見一并鏟除，恢復如來本地風光。將新的佛教論理，通過種種方式，灌輸到社會各階層，俾學者信者真正達到現前身心受益，未來得到解脫，令佛教呈現出一個嶄新面目，以示世人，清洗佛教所蒙受的冤辱。

**倡導辦學院**：社會上，新舊文化抵觸激烈。而教內新老易承亦迫在眉捷。老的畢竟老了，他們不唯不能接受新事物（指佛教革命），而且也不能適應時代的嬗變。一味的循規蹈矩，固步自封，格守舊禮，對佛教發展形成了巨大阻礙。要想續佛慧命，推行政革新，就必須造就一批年輕有為的僧伽，遂創辦閩南佛學院、武昌佛學院、漢藏教學院，爲佛教造就了大批新人。從而使萎靡了數百年的中國佛教重現新機，更爲佛教以後的發展埋下了正因，播下了良種。

晚清已是規廢律無，僧人各自爲是，互相攻擊，弊端競起。大有不可收拾的狀況，大師所作「整理僧伽制度」，對當時佛教可謂久旱逢甘露。「整理僧伽制度」包括了整飭規制，潔化僧團以及成立「佛教正信會」兩方面。目的在於使僧俗協手，共御外道邪衆，共匡聖教。大師對於當時「佛教正信會」所提要求所付重任，也是值得今天每一個社會佛教組織乃至信衆所借鏡與效法的。其中講到：「杜異道之凌亂，持正信之繫統。廣佛教之徒衆，大佛化之事業。互相資助以收研究切磋發揚光大之益，擁衛僧儀，護持佛宇，輔進淨德，屏弊凶邪。和光同塵，遍住於種種流俗之內。宣傳正法，講演真理，以醒世人之迷夢而減人世之惡業。合羣策之力，籍衆擎之勢，以之體正覺之慈悲，行大士之方便，世間現苦，廣爲救濟。」由此可見，教制革命，不唯當時，就是今天，也是勢在必行的。

人類，是在不斷發展與演變中求生存的，自然界發展的客觀規律亦是如此。而佛教更有必要在其發展過程中破舊納新，求適應求生存，並且在現實社會中起到它應有的作用。

**教制革命**：馬祖創叢林，旨在令僧衆行止有歸。百丈立清規，旨在規範學人遠離過非，懷佩正道。然而，中國佛教自宋朝至